

总的来说，肖像画分为两种：板着脸的和笑着的。通常职业人士（也许除了演员）的画像都板着脸，而先生、女士们的私人画像都带着笑容，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看上去不聪明。

查尔斯·狄更斯  
《尼古拉斯·尼克贝的人生历险》第 10 章，1839 年<sup>(1)</sup>

贺拉斯在《颂歌》中承认，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为我绽放的一个微笑。我相信对于一切有信念的人来说，贺拉斯的话都非常正确。

莫妮卡·M. 哈金斯 ( **Monica M. Hutchings** ) ， 1951 年<sup>(2)</sup>

# 引 言

## “板着脸还是笑出来”

写作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于 1998 年，那是在牙医和口腔颌面外科医生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我的几位好朋友恰巧是牙医，但牙齿并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所以我想不通这么一大帮医生为何要听我这个博物馆馆长关于艺术的演讲。

他们倒是没有像我这样想不通。按照要求，我要说的是 18 和 19 世纪欧洲画家定义美丽脸庞的标准的变化。如今的牙医们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由于专业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他们能够对人的面目做越来越戏剧性的改变。对那些面目狰狞的人来说，这样的改变就像是奇迹一样。如今，关于美丽脸庞应该包含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脸是丑陋的、不招人喜欢的、因此适于治疗的，一些专家级的牙医和美容医生有着明确的看法，这让我颇觉讶异。得知自古以来深受西方建筑师和美学理论家青睐的黄金分割<sup>(3)</sup>也活跃在现代牙医和美容医生的头脑中时，更是让我大吃了一惊。利用黄金分割，他们确定下巴到嘴唇、嘴唇到鼻子、鼻子到眉毛等等的最佳距离。我查看了牙科的文献，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前后对比照片（大多是女人的）。手术之前，她们都眼神悲伤，塌着肩膀，头发稀疏，面容沮丧；但手术之后呢，她们全都充满了个性，拥有了洁白的牙齿，露出亚马逊女战士一样的灿烂笑容。

我试图回想那些艺术作品，不管什么作品，只要里面有部分或全部露出的牙齿。毕竟，牙齿非常难画，从两片张开的唇间看那些

崎岖不平的牙齿，其透视效果应该算是对画家最严格的考验。有的艺术家把牙齿画得很美，比如 16 世纪的荷兰画家马尔登·凡·黑姆斯克（Maarten Van Heemskerck）。但大部分艺术家认为牙画起来太麻烦，不值得大费周章。幸好除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绘画中经常作为死亡象征出现的骷髅，有机会露牙的脑袋并不多。有一些被切掉的脑袋嘴巴邪恶地张开，比如荷罗孚尼（Holofernes，《圣经·旧约》中的人物——译注），或者大卫王脚下的歌利亚，或 1818 年杰利科（Gericault）对于斯德哥尔摩死尸头颅的骇人研究。英国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瑞（James Gillray）和乔治·克鲁相克（George Cruikshank）创作了一些富有讽刺意味的怪诞形象，对他们来说，大张着的嘴巴与骇人的牙齿，无疑是英国摄政时期荒淫、贪婪以及种种地方性腐败的绝妙影射。17 世纪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南北的画家作品中，时常会出现看牙的庸医、江湖游医和拔牙人的形象。塔斯马尼亚的一位同事，告诉了我流传不广的圣阿波洛尼亚（St. Apollonia）<sup>(4)</sup> 的绘画题材，据说她被拔光牙齿折磨致死。牙医最有趣的段子是关于哈布斯堡国王和君主们的。他们世代都有突出的下巴，学名应该叫下巴前突或三级骨骼咬合不正，这也许来自与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的血缘关系<sup>(5)</sup>。遗传特征，加上难看的视觉效果——突出下巴、下垂的厚下唇、稍微外翻的下眼睑，就像一把用坏了的锤子——难坏了 17 世纪温文尔雅的肖像画家们，包括大师迪亚戈·委拉斯贵兹（Diego Velazquez）。弗朗西斯科·戈雅比较勇敢，1800 年他实事求是地为西班牙的玛丽亚·约瑟法公主（Infanta Maria Josefa）画了肖像画，没有任何美化和取悦。

简言之，就我的了解而言，艺术作品中大部分牙齿和张着的嘴都属于肮脏的老男人、守财奴、酒鬼、妓女、吉普赛人、正经历宗教幻想的人、侏儒、疯子、鬼怪、被诅咒和被恶魔附身的人，还有收税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长满健康牙齿的地方却有许多裂缝和窟窿。最恐怖的牙齿<sup>(6)</sup>往往出现在基督受难场面，迫害基督的人扭曲的嘴里露出野兽一样的尖牙，伴随着另外一些让人作呕的特征：

长着毛的肉瘤、发炎的粉刺、囊肿以及其他流脓的疮痍。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肖像画的伟大传统都是掩盖画中人的皮肤疾病，并让他们嘴巴紧闭。

艺术中裸露的牙齿很少见，但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我开始留意作品中的笑脸。起初我以为笑脸也会很少，尽管有著名（即便是恶名）的标志性笑脸，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法兰斯·哈尔斯的《笑脸骑士》（*The Laughing Cavalier*）。但是随着涉猎的增多，我发现笑脸还是经常出现。我第一个观察的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的《手拿荷罗孚尼头颅的犹滴》（犹滴，《圣经·旧约》的人物，犹太寡妇，杀荷罗孚尼而救其人民——译注），克拉纳赫显然为画荷罗孚尼血淋淋的头和大张的嘴很用了心思。但是直到在格拉斯哥面对这幅画的原作的时候，我才领略到了克拉纳赫笔下时装样片般的犹滴，以她镇定自若的冷淡笑容向震惊不已的参观者致意。她戴着手套的右手握着仍在滴血的剑，这把剑砍掉了可怕的亚述醉鬼荷罗孚尼的头。但是她的手指优雅地翘着，头发和帽子上的羽毛装饰都纹丝不乱，简直就是当时的时尚太太。她泰然自若，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仿佛在说：“不服吗，小子？”

参观纽约弗里克收藏美术馆（*Frick Collection*），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微笑。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那些开朗的笑着的女孩，她们手里通常捧着一杯葡萄酒，身边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来客。旁边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玛丽·爱德华小姐》（*Miss Mary Edward*）。她微笑着，身上有很多缎带和珠宝（她很有钱），连她膝盖上的小狗似乎也在笑。同一间展厅里还有乔治·隆尼（*George Romney*）笔下光彩照人、目光温柔、伫立风中、像“自然女神”一样微笑的《汉密尔顿夫人》（*Lady Hamilton*）。另一间展室中，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笔下脸颊绯红、明显不漂亮的《达鲁伯爵夫人》（*Comtesse Daru*）笑得很勉强，似乎厌倦了安静地坐着。

同样让我惊讶的是，一份随意翻出的旧货商品目录<sup>(7)</sup>让我见识

了更多的微笑。一个 15 世纪晚期的德国胡桃木雕刻中，还是婴儿的基督在圣母玛丽亚的怀抱中开心地笑。一个 14 世纪早期的法国石灰石天使头像，商品目录里称之为“鬼脸”，它显然在咧嘴大笑。一对古怪的西西里雪花石膏狮子，牙齿粗钝而巨大，长长的鬃毛好像假发，对着镜头低声轻笑，狮子的脸颊上布满笑纹。英国的一件原始时期的橡木浮雕碎片上，一个相貌奇特、秃顶暴眼睛的半人半兽的家伙，露出最淫荡的笑容。

书籍和展览目录中的笑脸也越来越多。比如福塞利（Fuseli）活泼但有点吓人的《Fairy Mab》有很多个版本<sup>(8)</sup>。曼彻斯特还收藏着他画的跳起来的大肚腩胖子《帕克》（Puck），或者 W. P. 弗里斯（W. P. Frith）迷人的《Dolly Varden》<sup>(9)</sup>，手放在臀部，扭着头；她是 18 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Barnaby Rudge》中的人物。与此同时，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的《三道主菜和一份甜点》所作的插图中，乔治·克鲁相克翻开了牡蛎壳，展示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梨子形状的人懒洋洋地躺着，带着最和蔼的笑容——太能打动热爱牡蛎的人们了<sup>(10)</sup>。

一次拍卖会上，18 世纪的一幅画吸引了我，画中荷兰小男孩坐在墙上，剖开鱼去除内脏并清洗，但是他为什么带着难看的神秘笑容？即使像纽扣这样无聊的东西，也引起我的好奇心<sup>(11)</sup>。一些美丽的古代英国调羹的两端，往往画着极小的人像：张开大嘴笑着的多毛男人，或者叫“Woodwoses”，还有神情懒散带着宽沿帽的耶稣使徒<sup>(12)</sup>。

为数不少的传记作家，开始通过著名人物肖像画中的微笑，去揣测他们的内心。被揣测的包括尼克尔·马基雅维里<sup>(13)</sup>（Niccolò Machiavelli）伊曼纽尔·康德<sup>(14)</sup>（Immanuel Kant）等。1796 年，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在书的扉页刊登了一张自己的画像，这成了后人展开想像的对象。维洛里（Viroli）最近的《尼克尔的微笑》（Niccolò's smiles）一书，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桑蒂·迪·狄托（Santi di Tito）为马基雅维里所作的著名肖像画，是否抓住

了一种高深莫测的冷笑、欢快的微笑或者一种“仅仅是对荒谬的深刻认识”。玛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用势利的眼光对贝诺伊特-康斯坦·科古林（Benoit-Constant Coquelin）的脸作了一番回顾评论<sup>(15)</sup>。科古林是法国喜歌剧的伟大演员，在阿斯奎斯嘴里，他“像瑞士蛋卷一样圆，笑容是农民式的，最高明的化妆术也无法让他看上去显得阴险”。在某种程度上，微笑，为广泛地评价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和气质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

此外，一些艺术家和传统习俗比其他人更加青睐微笑。比如 17 和 18 世纪的荷兰风俗画，代表人物是扬·斯泰恩（Jan Steen）。即使是以冷静和内省著称的约翰内斯·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也画了大量带着笑容的人物（图 0.1）。比较起来，在非洲和前哥伦



图 0.1 约翰内斯·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弹吉他的女人》创作于 1672 年，布面油画，203/4 × 18 英寸。伦敦，肯伍德博物馆（Kenwood House）。

布时期的美洲的雕刻作品中，包括雕像、面具和别的有面部的作品，几乎没有面带微笑的。但是，广泛分布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表现生动的面部表情：张开嘴、露出牙齿、怒吼和咬的动作。似乎说明雕塑家们有表现笑脸的意愿，但由于某种原因终究没有那么做。

鉴于此，我打算向我的牙医听众们作一个关于微笑的演讲<sup>(16)</sup>。内容集中在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化领域：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什么前拉斐尔画派的艺术家们，比如福特·马多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和威廉·赫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对牙齿和张嘴微笑那么感兴趣？亨特的作品《觉醒的良知》（The awakening conscience，创作于1853—1854年）首次展出的时候引发了很多负面的批评，因为它的题材是性欲。不管是钢琴旁唱歌的神情懒散的大胡子奸夫，还是良心发现从他腿上跳起来的堕落女人，都露着整齐而洁白的牙齿，这是巧合吗？那么布朗创作于1852—1856年的杰作《工作》中的露齿而笑，又说明了什么呢？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F. D. 莫里斯（F. D. Maurice）在画的右边，脸上带着奇特的笑容，他似乎是个不相干的过路人（图0.2）。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年）一书中，卡莱尔抨击了工商自由的经济政策，流露出了对工业革命中穷人的同情，对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关键影响。在卡莱尔的影响下，19世纪40年代晚期出现了一批宣扬社会责任的小说，比如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的作品。卡莱尔还影响了年轻的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通过罗斯金，他的影响波及到了艺术家布朗和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卡莱尔帮助了工业劳动想象力的形成，布朗正是以此作为《工作》的主题。卡莱尔并不是过路人，而是作为改革的支持者和那些工人们的朋友，他带着微笑出现，暗示了他在这场现代工业寓言中的奠基者身份。



图 0.2 福特·马多斯·布朗 (Ford Madox Brown, 1821—1893) :《工作》(关于作家莫里斯和历史学家卡莱尔绘画的细部)。创作于 1852 年和 1856 到 1863 年,布面油画,54 x 771/2 英寸。曼彻斯特,曼彻斯特美术馆。

维多利亚时代,对牙齿的兴趣显然并不局限于艺术范畴。法国学者希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研究了各种古怪的数据,得出了古怪的结论:因为吃肉,英国女人的牙变得很长<sup>(17)</sup>。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安东尼·特雷洛普(Anthony Trollope)不厌其烦地描述他笔下人物牙齿的形状、颜色和尺寸<sup>(18)</sup>。《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狄更斯仅仅描述了一下董贝的老板卡克先生的牙,就树立起了他的可怕形象<sup>(19)</sup>。从卡克先生出现的第一个句子

起，就“无可避免地要看见”他的牙，“因为只要说话他就要露出它们”。似乎卡克先生巧夺天工的牙才是主角，而不是生就这幅牙齿的那个人。卡克先生的牙就像眼睛，闪烁不停，洞察一切，“看透各种小伎俩”。“不管是猫、猴子还是猎狗，或者骷髅，都不可能一次露出比卡克先生还多的牙……”他笑起来就像鲨鱼。那又作何解释呢？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通常把嘴巴张开、露出牙齿视作不雅，有时甚至是粗鲁，他们也把这当成东方入浴者、土耳其女奴或不幸女人的显著特征。1891年，《波士顿家庭期刊》（*Boston Home Journal*）刊登了对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这位伟大女演员牙齿的详细评论，确切地说是对她在维克多里昂·萨杜（Victorien Sardou）和埃米尔·莫罗（Emile Moreau）的歌剧《克娄奥巴特拉》中出演的有争议的角色牙齿的评论。该杂志对于该剧异国情调特征的罗列中，重点对她的牙如何白做了描述。<sup>(20)</sup>

对牙齿的崇拜，总是与东方、异国情调和某些罕见场合联系起来，比如被尊称为“霍屯督的维纳斯”（霍屯督，非洲西南部的部落——译注）的撒拉（Saartjie Baartman）驾临英国时引起的轰动。19世纪，很多欧洲人对非洲面孔的描述，都没放过好好赞叹一番非洲人天然洁白的牙齿。1802年，一位跟随探险家尼古拉斯·保丁（Nicolas Baudin）的探险船到达“凡·蒂门的土地”（即塔斯马尼亚岛，凡·蒂门为该岛被荷兰探险家发现时的荷兰首相——译注）的自然学家这样说：“要在巴黎找出拥有36颗洁白牙齿的嘴，实在太困难了。”而当时迎接他们到来的当地土著居民，人人都有36颗洁白的牙齿。<sup>(21)</sup>

我很快就发现，牙齿和微笑这个题材涉及到很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研究的对象也形形色色：流动销售人员<sup>(22)</sup>、睾丸素分泌水平高的男人<sup>(23)</sup>、餐馆里的就餐者<sup>(24)</sup>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金牌得主<sup>(25)</sup>。不仅揭示艺术中对笑脸的表现（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我们交换、表现和运用微笑的复杂方式。比如上面举的第

一个例子，成千上万的流动销售人员被教导：在宣传册、手册和日常问答集中，要通过开怀大笑，“把阳光带到他们经过的每个角落”。换句话讲，要做“快乐王子”，这样才能更好地推销他们的货色。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个效果非凡的好策略。

关于第二个例子，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男人睾丸素分泌很多，这导致他们笑得远比其他人要少，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第三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对西雅图3家餐厅的328位食客的调查表明，女人比男人笑得更多，不管是微笑还是大笑，而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走神。在所有情况下，年纪越大的食客越不容易笑，而孤独的食客根本就不会笑。这些结论，最近得到了从事另一项研究的作家们的支持，他们发现，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处于共有的社会或职业角色，男人和女人的微笑习惯也许会变得一致；而且，餐馆这个环境也许很好地反应了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的自我意识或比较期望。

对于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22位金牌得主，他们后来都承认，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他们最开心。但是根据观察（互相之间和旁观者的观察），他们只在两种情况下微笑：一种情况是短暂的颁奖仪式中间，此时他们在和别人交流，最明显的就是和颁奖的贵宾之间；另一种情况是举起金牌向大众展示的时候，他们旁边还站着同样兴高采烈的银牌和铜牌得主。在后来的奏国歌、发表演讲以及别的活动中，金牌得主通常就不笑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气喘吁吁，甚至头晕目眩，这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所有的观察者都同意，金牌得主们都给人无比喜悦的印象。在上面描述的情况下，微笑和快乐的关系变得难以解释。（这类情境引发的很多问题，著名的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多年以来做了大量研究。）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微笑方式。根据巴黎一本流传很广的针对美国人的指南上所说，法国人很少对陌生人（甚或所有人）明显地微笑，所以，对于街头上开朗的陌生美国人的热情微笑，法国人很难做出同样真诚的回应。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种“无

缘无故”的微笑或者疯疯癫癫，或者蠢不可言，或者兼而有之。据这份材料说，隔阂一旦消除，法国人的微笑也会和别人一样温暖，“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一个准确的交汇点联系起来。<sup>(26)</sup>

最近的一个例子也表明了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微笑。一名爪哇技工安罗兹<sup>(27)</sup> (Aromzi) 被指控与 14 名同伙一起，于 2002 年 10 月在巴厘岛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和炸伤了很多年轻人，包括 12 名度假的西方游客。印尼当局逮捕了安罗兹之后，在邓巴萨 (Denpasar)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显然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安罗兹并没受过折磨或者任何形式的虐待。侵犯个人权利的事件在印尼并不少见，考虑到这次犯罪的国际影响，向公众表明警察在照章办事也很有必要。

西方人通过电视屏幕所看到的那天晚上的场面，让人迷惑不解。当着一群记者的面，那个愉快而年轻的囚犯与警察总长及他的属僚们互相握手、开着轻松的玩笑、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个场面有点让人心寒，使人想到双方串通一气，或者，至少也是个极没品味的玩笑。印尼当局怎么能传达他们和犯人是老朋友这样的印象？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在此举引发的抗议声中，一些人类学家试图解释事情并非如此。拿出了“文化差异”这个息事宁人的法宝：印度尼西亚人有自己的做事方法。根据墨尔本大学的阿里尔·赫尔扬托 (Ariel Heryanto) 博士的见解，微笑并不一定“意味着嫌疑人和官员之间的愉快、欢乐和友好，也并不意味着对巴厘岛爆炸事件受害者的敌对态度。他们是‘笑’了，但并非‘笑’某个人或某件事”。

从某种程度上讲，根据人类学的文献，印尼人的微笑的确需要仔细斟酌一番。早在 1972 年，荷兰籍流亡人士 O. G. 罗德 (O. G. Roeder) 就出版了一本小书《印度尼西亚的微笑》，认为虽然很多日常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人似乎“生来就会微笑”，有时候他们流着眼泪也还在微笑<sup>(28)</sup>。罗德的许多观点，是建立在多年密切观察的基础上的。

印尼或者至少爪哇的言谈举止和传统之外，还有一种没什么说服力的语言学解释。它认为在印度尼西亚语中，c、j、t和p需要把嘴唇咧得很开才能正确发音，所以，一旦说印度尼西亚语，就不得不微笑。笑意盈盈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在印尼本国的媒体上掀起波澜。它们似乎对此见怪不怪，也许反而对于西方人的小题大做感到奇怪。

与此同时，某种程度上的合理考量也被归结到了安罗兹和围在他身边的那帮穿制服人的行为上。警察微笑，目的是向世人展示他们的人道；安罗兹回报以微笑，则是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而尽力合作，或者叫“守规矩”。但不可否认，那一次明显有一种不拘小节的亲切友善，其轻松随意的气氛，你或许会把它跟食堂或者酒吧联系起来：囚犯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似乎根本就不策略、不理智，不是在进行表演。也许最合理的“文化差异”解释应该是：警察和罪犯微笑，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那样，因为那是他们从小就培养出来的方式。”换句话说，西方人倾向于从爪哇人、巴厘岛人或苏门答腊人的笑脸上读出超过其应有的更多含义。我们希望从中得出温暖、友爱、好客、善意和慷慨的印象，因为这是西方人眼里微笑所代表的内容。根据这个观点，事实上，我们应该将印尼人的微笑视为一种默认的姿态，或者是为了表现得举止得体而由习俗所戴上礼貌面具。

牙医听众们热烈反响，激励我充满信心地进一步探索微笑这个题材。但是还有什么别的可写呢？对于微笑这种转瞬即逝的个人化的东西，不管是绽放在自己脸上还是挂在别人唇边，不管是发自肺腑还是心怀鬼胎，都有其不言自明的含义。微笑也许是我们身体所能做到的最快的肌肉收缩运动。从解剖学、神经学和心理上讲，这很好理解。更进一步说，微笑的语汇和机能一直扎根在人类的本能之中，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然而，对我而言，根本性的问题接踵而来。微笑这种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动物界里，从海豚、短尾猿、狒狒到狗，还有笑得合不拢

嘴的猫。科威特发现过一幅 14 世纪伊斯兰微型绘画，它是 Ibn Zafar 的寓言《Sulwan al - Muta》的插图<sup>(29)</sup>，画的是一头熊和一只猴子在一起。熊张开的嘴被清晰地描绘出来，明显是在开心地笑。这表明他是在和猴子玩耍，而不是要吃掉它。但是，动物这种拟人化的“微笑”，和人类的微笑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呢？我们只是根据人类所知来看待动物，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人们才把微笑变成了认同、亲近和交流的有力方式？什么时候人类学会了对自己微笑？微笑，而不是嘴，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面部表情？据说眼睛有时候能够微笑，尤其是爱尔兰人的眼睛，这让微笑转瞬即逝、难以捉摸和忽然来去的特性更加显著。这些问题带我进入了更加陌生的领域，比如化妆的历史、幽默、禁忌、胡子和络腮胡、毁牙（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墨西哥流行的一种骇人行为），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给牙齿定型和装饰的方式。

所以，本书力图从最广泛的角度阐述微笑。关于到底什么是微笑这个问题，是否人们能区分“真”和“假”的微笑，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对此也存在着很多争论。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他关于性欲的书中的观点很让我震惊<sup>(30)</sup>。他认为，不管是像本能一样自然流露的自发的微笑，还是不自发的微笑，“根本不是微笑，而是一种做出来的表情，当然，它也许有自己出现的理由……但绝对不是灵魂的表情”。他认为真正的微笑是类似脸红的反应：“在你知道我是谁以及我的感受之前，对我的一种不自觉的认同。”如果同意了这种观点，区分微笑和假笑就会非常困难。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微笑者的目的和他们引起的不自觉的反应交糅在了一起，让两种微笑都显得“真实”。我并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微笑必须“是对于某人或某事，所以当我们在街头看到微笑的人时，通常会认为他在‘对自己微笑’，就是说他的思想和感情里隐藏着让他笑的东西”。当然，这对于佛祖并不适用，对于神经病也不适用，而且在剧场里看到舞台上复杂和有趣的事情发生时，我也认为我在和舞台上的人或事情一齐“微笑”了。

接下来的话题很多，餐桌礼仪、神经学、婴儿的行为发展、性和美术史。我并不想运用无数的研究方法，罗列出一些科学和人类学数据。我要写的是更人性化的一本书，详细探讨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值得留意的微笑类型。比如，彬彬有礼的微笑而不是淫荡的微笑，爱人的微笑而不是骗子的微笑。

“微笑”这个术语可以指无数与嘴唇运动和别的面部肌肉运动有关的现象。从婴儿流露的微笑到喜剧面具，从佛祖神秘的微笑到新闻播音员的冷笑，还有很多其他的微笑。对一个人来说是友好的微笑，对另一个人也许意味着拍马屁，对第三个人也许是愚蠢的表现。微笑者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在展示自己的微笑，否则也许会三思而后笑，以达到捉弄或误导的目的。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微笑都是一种很有效的沟通方式。

这个话题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的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看待个人表情（不管微笑还是不微笑）的复杂方式。通常，越是久远的年代或偏僻的地区，标准就越奇特。当然，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早期美国的伟大总统们的外表，都非常符合共和党的美德标准：很多人长着方下巴，神情通常很严肃。可以想想位于里士满（Richmond）的弗吉尼亚议会大厦、出自哈德森（Hudson）之手的著名的华盛顿总统雕像的模样。众所周知，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时候，只剩下一颗牙齿（位于口腔的左下方）。他戴着用金属线箍住的河马牙和象牙做的假牙，一定非常不舒服，也一定不怎么漂亮，而且随时会自动“啪哒啪哒”地张开。假牙中还有一个孔，是为了放置他那颗硕果仅存的真牙。假牙的味道一定很恶心，他的解决方法是夜里把假牙放到波尔多红葡萄酒里，当然，这也于事无补。<sup>(31)</sup>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个子非常矮，据说，1776年弗吉尼亚会议时，他几乎被淹没在人海里。按照吉拉德·亨特（Gaillard Hunt）的描述，“麦迪逊总统准备发言的时候，身体像拉锯一样前后晃动”<sup>(32)</sup>。对于麦迪逊的微笑，我们所知甚少。托马

斯·杰弗逊年轻的时候有一口坚固、整齐的好牙，但后来，在公共生活中人们似乎很少见它们一展风采<sup>(33)</sup>。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一生中，智力和道德的兴趣同样显得格外庄严，1830年退休之后，他每天所做的就是把旧约中的《诗篇》翻译成英文诗歌、钻研经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种品质，或许可以指望从一位伟大的新英格兰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身上找到<sup>(34)</sup>。从自己辉煌的事业中退休之后，林肯的身高（6英尺4英寸）、体力和好脾气都让人怀念不已。一些关于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轶闻，着重说到他年轻时很会讲故事，还指使一帮男孩大喊着滚动圆木。但在5美元纸钞上，这位第16任美国总统的肖像实在很严肃。这倒也并不奇怪。

不久之后的尤利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甚至比林肯更长时间地处于内战的阴影中。1877年6月，在伦敦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格兰特的表现非常精彩。据传记作家詹姆斯·佩尼·伯德（James Penny Boyd）说，格兰特“表情十分冷静，和在‘旧弗吉尼亚’战斗中，在战鼓声中下令让战士们冲锋时一样冷静”。一位主持欢迎会的子爵夫人说：“他看上去像个士兵。”换句话说，战士总统、“一流雄狮”之类的概念，就像他的抽雪茄一样，在英国贵宾中激起了浓厚的兴趣。与这位接受伦敦自由勋章、深受欢迎的士兵总统比较起来，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甚至善于奉承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想必显得太过严肃了。<sup>(35)</sup>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1893年以后，格罗夫·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总算能够微笑了。1893年他56岁，正处在关乎联邦金银储备的空前经济危机中。他的左上腭长了一个东西，秘密的取样检查显示，那是恶性肿瘤。进一步的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上腭骨并到达了二尖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虎牙），感染面积大约有一英寸。克利夫兰必须马上动手术，手术在纽约东河一艘游艇上进行。克利夫兰坐在面向桅杆的椅子上，周围是一些亲密的同事，包括国防部长丹尼尔·司各特·拉蒙特（Daniel Scott Lam-

ont)。成功地实施麻醉后，手术医生取下总统的二尖齿，切开上腭，去除第一颗二尖齿到最后一颗臼齿之间的左上腭。使用了一个很大的面部牵引器。眼眶，就是围绕眼球的很多小骨头，并没受到损害，上腭切除也不是很多。更难以置信的是，出血量很小，只使用了一个血导管“，伤口也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sup>(36)</sup>

游艇从长岛海湾向科德角航行两天之后，总统先生已经可以起床走动，能够独自下船了。3 周后他回到华盛顿，硫化橡胶填补了取下的上腭骨留下的空白。这个手术是纽约牙医卡森·C. 吉布森（Casson C. Gibson）做的。手术后总统仍能正常说话，平平安安地又活了 15 年。消息最终还是泄漏出去了（吉布森博士自我吹嘘时说漏了嘴），其重要性也终于被人们所认识，许多人简直不敢相信。

总之，公开严肃，私下轻浮，似乎一直是总统们行为举止的典范，到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时期仍然这样。此公总是笑容可掬，尤其在公共场合。1919 年 1 月他去世后，报纸上流传着一些错误的报道，说罗斯福总统是因为一颗受到感染的牙齿而致死的。这并不正确，《全国牙医联合会通讯》在当年 6 月出版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实际上罗斯福死于冠状动脉血栓症）。报纸上的报道大意是这样写的：“那些闪亮的洁白牙齿为他赢得了数以百万的朋友，然而其中的一颗却害了他。”行动主义者（这多少是他自封的）罗斯福经常咧着大嘴出现在照片上，他告诉纽约的共和党人：要“甜言蜜语，手持大棒”。他的牙齿在欧洲受到一致的好评。<sup>(37)</sup>

如果说 19 世纪的总统大都走严肃路线，那么在别的职业中，公开和私下的微笑有同样的区别吗？神父、法官或者教授们是这个样子吗？到底那些学识渊博的职业人士有什么微笑习惯呢？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威廉·欧本（William Orpen）爵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柯斯莫·高登·朗（Cosmo Gordon Lang）所作的肖像画。在伦敦蓝贝斯宫（Lambeth Palace）向来宾展示这幅画时，主教大人说自己并不喜欢它，因为一位来宾曾经说在这幅画里的他显得“傲慢、自负和盛

气凌人”。主教大人说完不喜欢后，达拉莫的主教，德高望重的赫伯特·汉斯利·汉森 (Herbert Hensley Henson) 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敢问阁下，那位来宾说的话中哪一个形容不合适呢？”后来，坎特伯雷大主教向比勒陀利亚的主教承认，他的肖像画的确显得“傲慢、自负和盛气凌人”<sup>(38)</sup>，这部分原因是他不想让后人在他脸上看到“和蔼的微笑”。朗主教的传记作者 J. G. 洛克哈特 (J. G. Lockhart) 这样认为：“主教大人回避微笑就像回避魔鬼，他要传达的信息是：这不是柯斯莫·高登·朗本人的画像，而是柯斯莫·高登·朗主教的画像。”

如今主教们笑得比过去多得多，尽管他们似乎没必要笑那么多。但是，法官们仍然没有类似的微笑自由，他们不得不在大多数时候板着脸。除了极少数例外，微笑都会冒给诉讼代理人、被告或任何申请人带来误导的风险。19世纪60年代，首席大法官威廉伯爵曾经说过：“法庭需要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为沉闷的法律程序带来真切的幽默感。”他似乎是个例外。在死刑依然存在的国家和地区，新法官总会收到这样的忠告：不要让媒体拍摄自己微笑的照片，因为报道死刑消息的时候，刊登的总是这样的照片。<sup>(39)</sup>

另一方面，200多年来，铺天盖地的广告挤满了报纸、公共建筑的墙壁和公共交通工具。这些费尽心机吸引我们注意的东西，几乎可以编成一部现代微笑的百科全书。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几乎清一色的由微笑者完成——喜气洋洋的父母、悠闲的抽雪茄的帅男、带着满足微笑的摩托车手和高尔夫球手、举着袜子开怀大笑的小孩子，还有电影明星们。“我喜欢看男人抽小雪茄。”汉弗雷·博加特夫人（劳伦·巴考尔饰）这么说。在广告中，密尔沃基出生的钢琴家利贝雷斯 (Liberace) 说：“Blatz 是密尔沃基最好的啤酒……” 罗纳德·里根说：“杰里斯不喜欢油头粉面，他喜欢健康的头发。”穿着吊带晚礼服、为穿无尾晚礼服的绅士们做煎蛋的女士，通常都扭着头甜蜜地微笑。Nadinola De Luxe 无油增白乳液，“油性暗色皮肤女士们的福音”，配的是撩人的微笑。健身房里的男人骄傲地